

· 符号学 ·

符号学第一悖论: 解释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

赵毅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 符号学是意义之学, 而意义是意识与事物世界的关联。由此产生一系列的难解之谜: 究竟是先有事物, 然后用符号替代它, 还是先有符号, 意义是符号的创造物?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因为它关系到符号学研究的重点何在。文章提出符号必然先行, 才迫使解释意义从不在场进入在场。也就是说, 在符号出现的此刻, 解释意义必定不在场。由此可以推论: 意义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有待于实现的世界, 如果符号是此刻的存在, 解释意义就必然是未来性的。过去属于组成前理解的经验, 符号感知为此刻, 而解释意义在未来, 这就是意义世界的时间性存在方式。

关键词: 符号; 意义; 不在场; 未来性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05(2018)02-0001-05

doi: 10.19642/j.issn.1672-8505.2018.02.001

The First Paradox in Semiotics:

The Absence of the Interpretive Meaning Calls for Signs

ZHAO Yi-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meanings, which are relations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the world of objects. Hence a series of puzzles: objects call for signs to stand for them, or signs create meanings? This question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as it decides the focus of semiotic stud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signs must precede interpretive meanings which are not in existence when signs appear. The world of meaning is fundamentally something of becoming. If signs exist in the present, interpretive meanings belong to the future, or we may say that the past is for the experiential fore-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is the moment for signs, whereas the interpretive meaning belong to the future, thus forming the existential scheme of time.

Key words: sign; meaning; absence; futurity

一、解释意义何时不在场?

西方对符号的传统定义是“一物代一物”(aliquid stat pro aliquo), 不少符号学家至今坚持这个定义。哪怕我们把这里的“物”看成是“事物”(entity), 不一定是物体(thing), 被代之物依然是事先存

在的, 等着被符号之物(符号载体)所取代。显然, 这个定义已经严重过时, 符号学的进展已经远远把这个定义抛在后面。这个定义的最大问题是把意义和符号的发生顺序弄颠倒了, 符号之所以被需要, 恰恰是因为它的解释意义(所谓“另一物”)不在场。

收稿日期: 2017-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作者简介: 赵毅衡(1943—),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符号学、叙述学、意义理论。

引用格式: 赵毅衡. 符号学第一悖论: 解释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7(2): 1-5.

笔者提出:符号的定义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而不是“一物代一物”。符号并非先存也非现存,它只是一个具有被揭示出意义潜力的感知。这个感知本身不是符号,只有具有被解释为某种意义的可能性,它才是符号。“替代”是双方都已在,“被认为”则意义尚未在,而是等待出场。意义是符号被创立、被感知、被接收的前提:整个符号的表意过程,是不在场的解释意义之“待在”(becoming)压力召唤出来的。解释意义不在场才会需要符号,笔者称之为符号学第一悖论。这就是为什么皮尔斯提出“只有被解释成符号,才是符号。”^{[1]308}这句话简单,明了,精辟。可以加上一句:尚未被解释成符号的,只是物的观相呈现的(或媒介再现的)感知。经验中的物的呈现或其媒介再现,变成上面说的感知,就会有引向意义解释的趋势,此时它们成为符号。

但是这个定义也决定了符号意义并不确定,感知被解释成什么意义,就是什么意义的符号。一幅苹果图案被解释成可口的水果,它就是植物符号;被解释成人的原罪,它就是宗教符号;被解释成牛顿一般的灵感,它就是科学符号;而没有被解释出意义来的符号,如同半夜无人街上的红绿灯,在意义传达方面无效,就只是潜在符号。但是一旦被接收者感知到了,没有被解释出意义的符号就会给接收者的意识施加压力,要求在其意识中得到一个解释,以完成自身表意的使命。

因此,何时解释意义不在场?在符号被接收者感知到,并要求解释时。由此造成的张力,可以称为“认知差”,这是符号表意的前提。例如我看到一个僻字,我不知道意义,我不得不去查字典或者问别人,但有可能长期查不出来。而如果认识这个字,它的意义实现就快得多。难字需要辨认,常用字一看即知,几乎不用思索,但是字不会自动转化成意义,它与意义之间总是有一步距离。在我提出一个解释之前,这个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意义有待实现的符号。

可以看到,所有的告示、通知、启事、标记等等,都是因为解释意义尚未在场而出现的:下课有铃声,因为尚未下课;寻人有启事,因为人还没有找到;“红色通缉”发出,因为犯罪嫌疑人尚未捉拿归案;会议要发通知,因为会议尚未召开;飞机失事要找黑

匣子,因为失事原因尚未分析出来;汽车警告铃声一直在响,因为安全带还没有系好;公路前方有塌方,提前一公里就有警告,如果司机已经看到塌方,则无需警告;历史遗迹处有纪念文字,如果游客知道此处的历史,就无须文字介绍;服装店衣服有S、M、L、XL等尺寸标记,家里衣橱中的衣服则有等于无,因为已经试穿过合身,无须再知道大小。我到外地出差,一到机场大厅,就有各种人举起名字牌等着,因为接的人从未见过我,尚不能从我的外貌解释出我的身份。电影《归来》的结局特别令人震动:陆焉识陪着冯婉喻,每年大冬天某个固定的日子,到火车站去举“陆焉识”牌接人,因为在精神已经不太正常的冯婉喻心中,他本人不是陆焉识,“陆焉识”这个名牌的解释尚未在场。

所有我们借以互相交流组成社会的各种证件、凭据、文件、钱币、信用卡、票据、提货卡、合同、签字、手印、誓言、条约、诺言、保证等等,都是为了保证其意义的实现。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需要粮票、油票等,目的是保证必需品供给可以得到满足。一旦“敞开供应”,此种票据供给券就完全无用。不过今日如果能找出来,或许能成为收藏品,这时它们就成了怀旧意义的符号。钱币是为了被解释出“购买力”的意义,但如《人民的名义》中的贪官囤积的一房子的钱币而不被使用,其就只是意义未实现的符号载体而已;而一旦在法庭上被作为定案的根据,那就成了可量罪的符号。

在另一个方向上,人类历史需要仪式、古迹、演示、博物馆、回忆录、历史书籍、学术研究等等来再现,因为历史已经过去,几代以后,有具体经验的亲历者已经消失。当历史已经从个人记忆中退场,它就不会自动在场。对于新一代,此时就需要各种陈迹的保护,把历史重新召唤入场。

不仅如此,人类的各种知识技能,也随着其发明人、提倡者、奠基人、思想家的消失而变成过去,这正是人类为什么如此重视教育的原因:只有符号能延续人类文明。如果不是用符号(言语、姿势、示范等)来展现,人类可能不得不上万遍地“重新发明”用火取暖,用轮搬运。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从育儿开始,所有的学校、课程、训规、教材,都是为了让知识得到传承:学习的起点,就是不懂,不知道,不了

解,而必须授之以符号,才能让这个文明的各种意义得到传承。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就是建筑在符号促进意义进场的潜力之上。

实际上整个权力体系,包括行政管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军事指挥体系,也是建筑在符号的意义可实现性之上。古人用圣旨、用尚方宝剑、用虎符、用金牌、用玉玺,传达治理国家机器与军队所必需的权威意义。今人的权力意义体系更加复杂,但是整个的公务员等级、军衔等级别符号,保证了指挥意义的实现方式。

最后,我们还能忘记艺术吗?所有的艺术,都是有意义的符号文本。很多艺术学家说,艺术是“没有所指的能指”,艺术只是“能指的游戏”,无意义可言。例如巴尔特说,文学艺术是“在比赛中击败所指,击败规律,击败父亲”;科尔迪认为艺术是“有预谋地杀害所指”。但是,不可能存在没有意义的符号,如果艺术符号完全没有意义,只剩下一个形式,这样的“无意义”艺术也不可能存在。艺术只是其意义比较特殊,按钱锺书的说法,不能“尽信之”又不能“尽不信之”,因为“知物之伪者,不必去物”^{[1]167}。艺术的特点是在指称上尽量虚晃一枪,而专注于解释。艾略特有名言“诗的‘意义’的主要用途……可能是满足读者的一种习惯,把他的注意力引开去,使他安静,这时诗就可以对他发生作用,就像故事中的窃贼总是背着一片好肉对付看家狗。”^{[2]125}例如演出结束要谢幕,死者也要从舞台上站起来,向观众致意,提醒大家这是一出以假作真的戏,谢幕把演出符号故事来个结束,重新连上真实世界,迫使观众寻求一个解释。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符号是为了引发意义才存在的,正因为解释意义尚未被引发出来,尚未被解释,符号的存在才有足够的理由。反过来,也没有不能引发解释意义的符号,因为那样的感知就不能被称作符号。进一步说,如果意义已经存在,符号也就不必存在,除非还可以解释出进一步的意义。例如出灯谜,一旦被猜出谜底,谜语就没有必要存在,但是谜语出得特别好,有诗意,可以继续欣赏,或是再被拿去炫耀自己挑战他人,那就值得记住。乘飞机需要登机牌,已经上了飞机,就不再需要;但是现在报账又要登机牌作佐证,因此又须保留登机牌

做凭据;报账之后,不需要此登机牌,而财务处必须留下作档案,以备今后查账,符号的生命被新的意义可能性延续下去。

因此,符号存在的第一条件,是其解释意义,或其解释意义之一,尚不在场。

二、整个意义世界需要符号才能引出

从上面说的无数例子,可以推论出一个令人惊奇的原则:意义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有待于实现的世界。人的思维的重要功能就是准备符号,人面对实践世界,在头脑中用符号设计出意义解释的方案(例如合同上签字并加日期),而意义本身则永远处于“待在”之中。只有符号才是连接时间的纽带:过去的经验,此刻的存在以及尚未实现的未来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的意识,必然是时间中的意义存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写了人与动物在意义活动上的重大区别“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起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3]178}马克思清楚地指出:思维的符号式想象,对世界预先进行意义实现方式的筹划,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特点。

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对象客体只是看上去先在,例如月亮升起在天,人们观察并且认知月亮,才能对之进行神话学或天文学的各种解释,但是这只是一种挪用,因为月亮的神话学意义,或天文学意义,并不是与月亮同在的,而是靠解释者凭借这个月亮符号解释出来的。是符号创造解释意义,解释的要求倒逼出符号,但意义不可能先于符号而存在。

符号之出现,是以解释意义尚未出现为前提的^{[4]45},符号不仅创造解释意义,而且塑造对象。例如“龙”“蛇”二个符号似乎本质相反,“蛇”似乎以现有之物为对象,存在于符号之先,“龙”则是现实世界所无,需要靠符号来塑造。“对象先行”与“符号先行”这两种意义活动,是在思维世界与实践世界两边出现的,方向相反,跨界活动。但是这只是说的符号感知的来源,而它们的意义出现顺序是一样的,都要等待符号出现变成接收者的感知之后,才能有解释来实现。

同是心灵符号组成的艺术——梦——错觉,不可能用来作实践活动的预判,幻想与艺术的符号意义,本来就不能进入实在意义世界,因此这些符号是“无目的”的活动,除非是军师的解释把主君的梦“再符号化”为异象,才可能被解释为上天引导出来的军政谋略。在人类的意识范围中,对象在先与对象在后,这二者的分野不会消失,但是二者的解释意义后出,却是相通的。这种对象——符号——意义的互相渗透,是意义世界的各个部分既能够分立,又能够结合的关键。

既然解释意义不在场,是符号表意过程的前提,意义就必须有符号才能传达,不用符号实际上无法传达任何意义。皮尔斯提出“我们所有的思想与知识都是通过符号而获得的。”^{[5]332}既然符号必须以解释意义的不在场为基本前提,那么相对于符号而言,意义活动必然朝未来敞开,意义本质上属于未来。推一步论之,意义始终是以不在场的形式在场。符号如果本身“有意义”,那也只是一种意义预期,例如闹钟响了是预判睡者会起床,但是实际上此人是否就此起床却是不可预知,只有等待未来显现结果。在符号表意的此刻,我们尚没有得到他的解释与回应。

我们见到一幅摄影作品,是一座雪山,但是这雪山并没有在场,它只是一个有出场潜力的意义。实际上雪山作为意义,甚至作为概念化的意义,可能永远无须出场。对于人类的意识而言,意义的缺席是一种姑且勿论,虚席以待,是一种期待。如火山口天池,边际齐全即无运动,有缺口才出现认知的压差,悬成瀑布,流出江河。符号等待解释,意义要解释后才能出现,这种滞后就成了符号意义的基本时间尺度。

三、符号是一张意义的欠条

既然之所以需要符号,是因为符号出现的此刻,意义并不在场,由此可以得出听起来似乎奇怪的结论:符号出现本身,就证明了意义之阙如。《论语》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正是因为祖宗的灵魂不在场,祖宗灵魂的替代物神位,才能被置于祭坛上替代祖宗灵魂,符号在,就使意义将会出现,这种意义期待是祭礼的理由。而解释者参与祭奠仪式,才能在他的心中引出相应的意义解释,否则解释无法入场。因此,一旦我们感知符号在场,可以非常准确地说,它的意义尚未

在场。如果我们要求意义在场,就必须亲自参与这个符号过程。如果我们把符号就当作意义,把神位直接当作祖宗灵魂,孔子就不必提出亲自与祭的要求。他如此要求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个符号的真正意义必须由接收者解释出来。

海德格尔直接把意义看成是筹划(Entwurf)的产物。他一再强调“意义的问题,亦即筹划领域的问题”^{[6]151}“意义就是筹划的何所向”^{[6]177},原因是使用符号本身就是意义的出发点“因为领会于它本身就具有我们称之为筹划的那种生存论结构……领会的筹划性质实际组建着在世界的存在。”^{[6]169}他甚至认为,人的领会与解释,并不是针对物本身,而是针对我们预期的“可能性”,原因是“解释植根于领会……解释并非要对被领会的东西有所认知,而是把领会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6]173}伽达穆尔把这种符号筹划的作用说得更加清楚“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做出正确的符合事情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而预期应当是‘由事情本身’才得到证明。”^{[7]272}就是对将会在实践活动中得到意义解释的预判。

符号发出者的意图,体现为一种想象,它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意义活动中产生功能,一种是在延续的日常生活中,是任何人都必须进行的;另一种是在各种文化领域,尤其是在科学与艺术的创造性活动中。一般说到符号世界中想象的作用,都是指创造性的应用,实际上,符号意图更重要的作用,是日常生活生存所必需的。这种符号活动在人类文明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人的庸常平凡的生活,依然是在意义世界之中的活动,因此也必须建立在符号意义这一人类最根本能力的基础上。人的意识作为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有能力从感官接受的模糊信息出发,凭借混乱无序的经验材料、对意义世界的有序的理解,把一系列选择性决策根据一个目的组织起来。

但是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对物的“数学筹划”,这是现代科学的形而上本质。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数学化,让“纯粹理性成为形而上学的引线和法庭,成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物之物性的规定性的法庭”^{[8]870},是现代人的悲剧。的确,现代科学发现新的行星、新的粒子、彗星的轨道,预判结构的稳定,都是先做数学运算,然后按此符号进

行实验操作。这样一来,符号就绝对准确地预判意义,甚至超前实现了意义,因为数学上算通,也就是意义的落实。实验解释变成了一种证实,而不是运算意义的实现,这实际上取消了解释的各种机动可能性:期待变成了决断,意义就成了必然之物。文化的人在解释中游走于各种不确定的可能之间,于是生存的艺术被取消了,变成了生活的定规。人的意义世界,被科学万能的范畴模塑所替代,一切无法数字化、实验化的表意方式,都被认为不符合意义“真值”的标准,从实证主义到泛科学主义,对科学的能力过度夸张,反而使人类的精神世界趋于贫乏。

“对于思想,人们经常忘记它是一种艺术,即精确性和不精确性、模糊性和严密性相结合的一种游戏。”^{[9]104}人的最平凡的生活常规,例如准备一日三餐,就是一场把混乱无序的感知、模糊的经验,组织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意义。作出如此复杂意义操作活动的人,包括每日操劳的母亲、操持家务的厨娘。人脑的想像力不断地在符号和意义之间过渡和游戏,而这正是人类进化所得到的智慧力量。

四、意义的未来朝向

所以,意识的意义解释能力是双重的。首先,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基本能力,它在人体验到的各种感知中,寻找不在场的意义。而这种能力,取决于解释者如何将意义发生与经验联系起来^{[10]91}。其次,人的意识总是在已存在的经验之中“成为我自己”,把经验的滞留变成客观存在,把期待落到将来,在符号与意义的交织中释放出时间之流^{[6]326}。意识重温滞留的经验,以经验为前理解并预判未来,这是一种创造新意义的活动,取决于它脱离旧有经验另找新意的程度。在解释中,守旧与创新并存。

因此,意义的生成之处,就是人存在于其中的时间,只有符号及其解释,才能把过去的经验的滞留,结合成为人的理解与解释的基础,前瞻未来。把不在场变成在场,用这样一种意义魔术,把过去与未来在当下的符号中统摄起来。

自从中世纪奥古斯丁解释以来,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维关系已成了老生常谈。此刻的现在是“刀刃存在”,它只是一个切换点;时间的绵延只有两个向度——过去与未来,时间如倒退的潮水,通

过此刻现在的闸门,不断地把未来推成过去。康德关于先验时空直觉综合的讨论,已经是大部分学者都接受的理解,但是海德格尔评论说:“(康德所谓)‘综合关联于时间’,实际上是一种同语反复。”^{[11]45}

过去看起来是最实在的经验,对过去我们可以生出无数记忆,写出数不尽的历史研究;反过来,对未来,即从此刻直到永恒的无止境时间延续,我们只能做出期待或预判,实际上所知为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下一刻将发生什么,当然更不会知道永恒会以何种形式到来。未来就是尚未知,所以,意义的“未来品格”也就决定了意义永远只能存在于未实现、未在场、未确定的状态。这就是时间为我们的意义活动给出的基本框架。

那么,究竟什么是意义呢?意义就是意识在关照客体对象(例如一个苹果),或是关照符号载体(例如一幅苹果的画)时,迫使对象“给予”的连接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就像一把手电筒,只能照亮部分对象的部分区域^{[12]128}。意识的这种意向性从对象构筑意义,一方面把事物变成意识的对象,一方面使主体以意义联系的一种方式进入存在。因此,意义既不在意识中,也不在客体对象里,而是产生于两者之间:意义是主客观的关联,实际上主观与客观靠这个过程互相分辨,互相构成。准确地说,意识——意义——对象,是构成物与两个被构成物之间形成的三联关系。

意识产生的意向性,是意义活动的推动力,但是意向性本身并不是意义的来源,不能说有意向性就会有意义,因为意向性必须落到对象上。意义是意向性“激活”对象后得到的反馈。世界万物(包括符号)在被意向性推入意义过程之前,是自在之物,安居于晦暗混沌的无意义中。有了意义活动,才会有事物或符号的意义秩序,而对象一旦被“意义秩序化”,它们就失去自在性,变得主观化、形式化了。

因此,意义与时间都是符号解释活动的产物,没有经验就没有过去,没有对符号的观照就没有现在,没有对符号的解释,就没有未来。意义的时间性,也就是时间的意义性。唯理论者认为时间产生于意识中,经验论者认为时间产生于对事物的感知中,而符号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认为“必须有一个处于世

(下转第11页)

个更全面的认识,不仅仅是对其静态位置特征的考察,还有对其在位置变化中所展现的交流与斗争过程的考察。

参考文献:

- [1] 陆正兰. 歌曲风格与标出性的关系[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3).
- [2] 赵毅衡. 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J]. 文艺研究, 2008(3).
- [3] 吴未意. 对文化标出理论的几点修正与扩展[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5(6).
- [4] 什克洛夫斯基,等.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 方珊,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 [5] 方小莉. 形式“犯框”与伦理“越界”[J]. 符号与传媒, 2017(1).
- [6] 周宪. 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7] 闫文君. 论网红文化的标出性[J]. 符号与传媒, 2017(1).

- [8]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9] 张冰. 陌生化诗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0] 曹洵. 网络符号冲突:理论逻辑、符号实践与话语功能[J]. 符号与传媒, 2017(2).
- [11] 庄文静. 从符号学视角分析西方音乐发展历程的标出性特征[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6(3).
- [12] 赫伯迪格.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 陆道夫,胡疆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3] 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曹卫东,等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5.
- [14] 宋颖. 消费主义视野下的服饰商品符号[J]. 符号与传媒, 2017(1).
- [15]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包亚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燕朝西]

(上接第5页)

界某个位置的目击者……时间不是流动的物质,也不是流动本身,而是出于运动中的观察者看到的景象的展开……因此时间产生于我与世界的关系之中。”^{[13]514}时间必定产生于主体与事物的关系之中,而不存在于意识或事物之中,没有主体的卷入,就不会有符号的解释。

“观察者看到的景象的展开”就是符号。时间本身,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意义所构成的,是意义活动的节点。没有意义活动,也就是说,没有符号意义,时间不复存在。不仅意义是在时间中才能构成,实际上意义才是时间存在的原因。一个得过且过浑浑噩噩的人,或是一个精神与大自然化而为一的人,就缺乏“时间意识”。时间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概念:不是意义引发时间,而是时间产生意义。意义与时间这两个思维的基本问题就落在时间框架中互相生成。意识对意义的综合,必然与时间联系在一起,朝向未来。

符号在场时,解释意义尚不在场。这条笔者称为“符号学第一悖论”的基本原理,不仅牵涉到意义活动的顺序,更是有关意识与事物如何互动产生意义,关系到时间本身是如何在意义活动中生成的。

参考文献:

- [1]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vol. 2)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 1958.
- [2] Eliot T S. Selected essays 1917—1935 [M]. London: Faber & Barber, 1932.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4]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5]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vol. 8)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 1958.
- [6]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节庆,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87.
- [7] 伽达穆尔. 真理与方法(上卷) [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8] 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 [9] 埃德加·莫兰. 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M]. 陈一壮,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0] MARTIN Heidegger.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1] MARTIN Heidegger.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2] 赵毅衡. 《意义的意义》的意义:论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部[J]. 学习与探索, 2015(1).
- [13]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责任编辑 燕朝西]